

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吴根甫^{1,2}, 胡宜霖³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3. 尚志大学 一般大学院, 江原特别自治道 原州市 26339

摘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三新”)党建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也是引领和保障“三新”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三新”党建还存在组织、功能、主体、制度、文化等诸多维度困境,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需在精准识别“三新”党员群体特征的基础上,重塑组织形态,构建“三维立体”的覆盖格局,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治理架构,提升队伍素质,健全“选育管用励”全链条的闭环体系,夯实制度根基,调整优化“双轨制”资源整合机制,深化协同治理,激活“党建+社会责任”的双轮驱动效应。

关键词:“三新”党建;党员;资源整合;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6.05.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6)05-0038-10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三新”)领域已成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点场域,但其组织形态的虚拟化、用工关系的弹性化与从业群体的高流动性,对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构成深层挑战。现有研究虽在生成逻辑、价值意涵与实践路径上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三新”党员群体特征的精细刻画不足,致使困境诊断与对策设计多停留于宏观政策阐释,缺乏基于群体异质性的精准回应。本文以“三新”党员群体的非传统组织形态、契约碎片化、价值张力、圈层情感及跨界行动等五大特征为分析起点,系统揭示当前“三新”党建

在组织覆盖、政治功能、身份认同、条块协同及人才支撑等方面的结构性困境,并据此提出组织形态重塑、治理架构嵌入、全链条队伍培育、双轨资源整合及社会责任驱动等纾解路径。研究旨在超越政策与实践的简单对应,为增强“三新”党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示。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演进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转型,

收稿日期:2026-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2CDJ033);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62400410601);河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YJS2026AL043)

作者简介:吴根甫(1983—),男,河南省鲁山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宜霖(2000—),女,河南省郑州市人,尚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三新”快速发展,并深刻重塑着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生态,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三新”党建问题研究应运而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3]。近年来,全国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加强“三新”党建,“形成了诸如北京经验、上海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杭州经验、成都经验等”^[4],学界也围绕加强“三新”党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三新”党建的生成逻辑。刘振鑫等^[5]把“三新”党建的生成逻辑归结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方面: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原则的必然要求;历史逻辑是从20世纪80年代党组织开始进入新经济组织领域,到“两新”党建再到“三新”党建的发展演进;现实逻辑是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题中之义。陈宁静等^[6]认为,“三新”党建是“两新”党建的扩展延伸,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健全党员教育管理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举措。

二是“三新”党建的意义价值。王文成^[7]指出,加强“三新”党建,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刘振鑫等^[5,8]指出,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发展、顺应社会组织形态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实践路径。

三是“三新”党建的现实观照。张勤等^[9]从实践场域、领域、方式三个方面,在系统总结当

前全国各地加强“三新”党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三新”党建方式路径依赖严重、创新性不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组织建设科学化程度低、政党与社会互动成效低等问题。陈波等^[10]通过分析“三新”领域党员的群体特征,从党员隶属关系、人员背景、工作方式、组织形态等方面,系统总结了“三新”党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金庭碧等^[11]指出,“三新”党建实践中存在工作部署与执行效果有落差、党建资源需求与供给有矛盾、党建引领成效与基层治理融合不足等问题。

四是“三新”党建的实践进路。陈波等^[10]就加强“三新”党建指出,要着眼于化解同一与差异、一与多、单一与多元、我与他、变与不变等结构性张力的“面”,着力于价值共识、利益共享和制度运行等关键的“点”,构建以价值共识为前提的凝聚机制、以利益共享为抓手的驱动机制、以制度运行为载体的保障机制。王文成^[7]提出了创新党建模式、压实党建责任、把握工作重点、提升履职能力、坚持人民立场五条加强“三新”党建的原则。刘正环^[12]围绕“三新”党建的特点、难点,认为加强“三新”党建工作,需要在组织体系上、作用发挥上、保障机制上找准党建与发展的结合点、组织与群体的连心点。

此外,少数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三新”党建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以及“三新”党建的领导体制等方面。杨昕^[13]从坚持党的领导视角出发,梳理了从“两新”到“三新”的提出过程,重点就“三新”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变革的基本逻辑及实践路径进行了探讨,指出党对“三新”党建的领导大体经历了从松散管理状态下的初步探索,到建立正式机构进行归口管理,再到组建社会工作部门进行专门领导的演变逻辑。祝全永等^[14]把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当前新就业群体党建存在“谁负责、怎么建、力量弱、起作用”

等问题;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应当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

回顾梳理当前学界对“三新”党建的研究现状发现,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对“‘三新’党建”的文本表述不统一。已有研究中,出现了“‘三新’组织党建”^[15]、“‘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8]、“‘三新’领域党建”^[16]等多种表述。这说明学界对于“‘三新’党建”概念的把握还不够精准,表述尚不尽规范。

二是对“三新”提出及演进过程研究不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把要求‘两新’组织成立党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写入到新修订的党章”^[14]。从“两新”党建到“三新”党建,其演进过程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拓展,又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时代需要。加强“三新”党建研究,需要置于历史的、连贯的、特定的场域,系统梳理其发展演进过程,学界对此研究尚显不足。

三是对“三新”党员群体特征研究不够深入。“三新”党员群体的个性化特征,构成了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切口,其多维属性映射出深层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加强“三新”党建需要立足“三新”党员独有的群体特征,准确把握新时代“三新”发展的新态势,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而当前学界对“三新”党员群体特征的深入研究不够,“宏观-微观”贯通不足,优化路径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与实效性。

笔者以为,从文本表述角度讲,“‘三新’党建”的表述最为精准,如涉及“三新”相关对象,可简称“‘三新’领域人员”。就“三新”的提出及演进过程来讲,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非公有

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各种新经济组织应运而生,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1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提法。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并提,把“两新”党建拓展为“三新”党建,将“三新”党建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尤其是“三新”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二、“三新”党员群体的特征论析

陈云指出,“共产党员是党的物质基础”^[18]。在党的事业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活动中,党员是具有能动性、自觉性、创造性的政治主体,是党内生活和党的实践活动的最终决定性的主体力量^[19]。精准识别“三新”党员群体特征,不仅是增强“三新”党建有效性的认知基础,更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任务。

1. 组织形态的非传统性与高流动性

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员不同,“三新”党员群体的工作场景已突破传统的集中式物理边界,其职业身份不再固定于单一法人单位,而是在“平台-外包-众包”的三元劳动关系中高频切换。这一空间结构导致该群体呈现出“物理高度分散、数字联结增强”的独特组织形态。相较单位制下党组织建立的科层化管控体系,“三新”党员群体处于组织结构末端的多节点平行系统中,物理空间隔离与虚拟空间联结并存,对“属地+行业”管理的双轨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三新”党员群体工作方式灵活,“组织架构变动频繁,流动性、不稳定性特点突出”^[12],这使得党员组织关系转接频率倍增,传统“党组织随人走”的管理机制面临执行

困境。

2. 契约形式变革与权益保障弱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在新就业形态中,用工主体更加多元、用工方式更为多样,以及用工管理数字化等因素导致劳动关系认定难度加大。《南京法院 2021—2023 年新就业形态用工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披露,“新业态不同行业的用工模式……大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部分平台合作商让从业者‘自愿’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由外包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以‘承揽费’‘服务费’的名义向从业者发放工资。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招工与用工分离、工作管理与发放薪资分离的状况,导致从业者对责任主体认知模糊,一旦发生纠纷,各主体间法律关系定性困难,增加了从业者维权的成本和司法审查的难度……在审结的 257 件新业态用工纠纷案件中,涉及两方主体的案件 56 件,占比 21.78%;涉及多方主体的案件 201 件,占比达 78.21%”。此种“契约碎片化”现象导致党员的组织归属感下降,由此引发的权益保障断层,客观上制约了党员参与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与心理安全感。

3. 价值整合模式的多层次张力

“三新”党员群体并非传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线性谱系中的单点存在,而是以劳动、资本、技术、数据四重要素的叠加性占有为特征:一方面可因平台算法工程师的身份而跻身技术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又在高强度“码农”劳动中共享脑力无产者的现实处境。多重身份叠合导致其既拥有向上流动的技术-资本通道,又面临向下沉降的劳动异化风险,从而塑造出更为敏感复杂的政治心理结构,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也易受平台流量、数据标签和推荐机制的深层影响:外卖骑手党员的劳动节奏被派

单算法实时调节,直播电商党员的话语策略被流量算法即时反馈。这种技术惯性一方面强化了党员对效率、公平、透明等治理诉求的数字化表达,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

4. 情感结构的社群化与圈层化

现代社会中,“单位人由原来对单位组织的强依附性逐渐被强制的力量甩进城市社区,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也由原来的‘国家-单位-个人’转变为‘国家-社区-个人’”^[20]。“三新”党员群体也呈现出显著的社群化与圈层化特征。具体而言,该群体倾向于以共同兴趣、专业技能与社会身份为纽带,构建起以“微社群”为表征的圈层化交往空间,在组织属性上兼具强情感黏性与弱制度约束的双重特征,其情感表达与身份认同在公域与私域之间快速切换,从而对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所依托的集中化、制度化情感动员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5. 融入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需求

数字平台所固有的去边界化属性,使“三新”党员群体扮演起“跨界行动者”^[21]的角色:网约车司机党员就像城市的“移动观察员”,可以在交通治理中提供实时信息;党员电商主播则借助网络平台,帮助农产品走出乡村,成为连接城乡的“云上推销员”。正因为如此,“三新”党员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国家战略落地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根据不同场景灵活响应、依靠数据做决策,并与多方共同创造价值。“三新”党员群体的组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主要依靠“单位-支部-小组”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模式,而现在逐渐转向了一种更为灵活、更网络化的“平台-场景-节点”模式。具体来讲,一名党员既可以在所居住社区的党支部报到,也可以在工作所在地的楼宇联合党委参加

组织生活,同时还能通过线上的“云支部”参与主题党日活动。这种分布式的组织形态,给了党员更多自主选择 and 表达意见的空间,传统党组织依靠“开会、发文、考核”管理的方式,效果逐渐减弱,组织管理模式亟须从过去注重过程控制,转向更加注重实际成效。

三、加强“三新”党建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经济结构优化及数字科技广泛应用等新情况,站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推动“三新”党建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该领域党建工作仍处于探索完善的起步阶段,在经验积累方面尚显不足”^[9],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

1. 党员组织管理难度加大

“三新”领域主体多元、边界模糊、人员高流动性等特征明显,使得党员组织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以新经济组织为例,其多以扁平化、柔性化管理为特征,产权结构的多元性、用工方式的灵活性与传统单位制党建的科层化逻辑存在矛盾。新社会组织则因行业属性差异化、规模大小不一,组织覆盖常因党员数量不足而采取联合建立模式,开展组织生活难度提升。《安徽省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专题调研报告》显示,“全省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中党员比例,分别为 1.27%、0.98%、1.33%、1.67%,流动党员多于在册党员,大量党员尚未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22]。平台经济的高度弹性用工、跨地域流动和零工化趋势,使得传统依托固定劳动关系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作用发挥有限,容易出现“组织覆盖空白点”与“教育管理断点”并存现象。

2. 政治功能实效性减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23],政治功能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三新”党建工作的本质与方向。“局部性的基层党建实践与基层社会变化的不同步,导致这些基层党组织自身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出现了局部性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悬浮化’现象。”^[24]新就业群体因其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相对较弱等特点,部分党组织开展工作方式单一,有效的情感联结和利益整合机制尚需完善,容易出现“有组织无活动、有活动无实效”的倾向。新兴领域的组织形态呈现迭代快、网络化、去中心化等特点,加上工作模式的高流动性、工作时间及地点的不确定性,党组织难以在固定场所、特定时段开展活动。个别党组织简单运用传统领域党建的活动模式,针对“三新”群体特点的创新设计不足,活动内容与党员需求紧密结合不够。

3. 价值多元与身份认同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25]“三新”领域人员由于自身较强的流动性、自主性和利益导向性,更容易受到多元价值的影响。例如,新经济组织中的技术研发人员、新社会组织中的专业服务者,以及新就业群体中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其职业发展往往与市场机制紧密挂钩,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可能优先于对组织归属感和政治身份的认同。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使得“三新”群体对党组织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等核心价值的接受度呈现分化态势,增加了党建工作中思想引领的难度。从身份认同的构建逻辑来看,“三新”领域的组织松散性、人员流动性打破了个体职业身份、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的高度重合性,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呈现“弱绑定”状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建工作的群众基础。

4. 制度条块分割与资源碎片化

“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传统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正在演变为‘条块分割’的局面,从而制约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26]一方面,“三新”往往具有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如平台企业的业务覆盖多个行政区域,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需求涉及交通、人社、城管等多个部门,传统以行政区划和行业隶属为基础的“条块”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其治理需求。条块分割的体制导致“三新”党建面临管理困境,垂直部门的专业优势与地方党委的统筹优势有效衔接需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地方党委对“三新”党建的指导多依赖属地管理原则,但部分“三新”(如全国性连锁企业分支机构)的党组织关系隶属于上级总部或行业主管部门,导致“块块”在资源调配、活动组织上权限不够。

5. 党务人才短缺与专业化支撑不足

“党务工作者,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居)和社区组织党建工作的规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单位党建工作的骨干和中坚力量。”^[27]党务人才短缺与专业化支撑不足成为制约“三新”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主体困境。“以南昌市为例,新经济组织中党员占比约为1.4%,新社会组织中党员占比约为4.13%,新就业群体中党员占比仅为0.09%”^[8],党员基数较小加剧了党务人才来源的匮乏。党务人才的能力缺口体现为“专业不深”与“创新不足”的双重短板。“该领域中的大部分党务工作者在执行党组织建设的相关任务时,普遍展现出能力欠缺、业务生疏、专业造诣不深的问题”^[9],对数字化党建工具运用不够熟练,工作方式创新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难以适应新业态下党员教育管理的复杂需求。年轻党务工作者往往缺乏系统培养和实践锻炼平台,难以形成梯次化、专业化的队伍结构,党务干部存在“无专职、无补贴、无场地”的现象。

四、加强“三新”党建的纾解路径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28]。加强“三新”党建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关键路径,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1. 重塑组织形态,构建“三维立体”的覆盖格局

首先,在空间维度上做到全域渗透,解决“组织在哪里”的问题。“在国家化简社会复杂性的工具排序上,‘以属地为基础’逻辑具有相对于‘以事务为基础’和‘以身份为基础’逻辑的优先性,构成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础逻辑”^[29]。针对“三新”领域党员分布零散、流动性强、劳动关系灵活等特点,必须突破“单位党建”的传统壁垒,构建起“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区域兜底”的立体化组织网络。具体而言,一是强化区域化党建,依托园区、楼宇、商圈等物理空间单元建立区域性党组织,对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党员进行“兜底管理”。二是探索行业性党建,由业务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党组织牵头,将党建链条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业务链,实现对同行业、同业态组织的“条线管理”,如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明确要求,“健全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出行等企业党组织。以头部企业为重点,推动党组织应建尽建”。三是推进网格化党建,与基层治理网格相融合,将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纳入社区网格党组织管理服务范围,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其次,在功能维度上做到精准赋能,解决“组织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推动党组织功能从管理控制向引领服务转型,实现组织嵌入

与功能耦合的有机统一,“党组织通过党建创新引领下的理念调适、话语建构、结构调整和行动适配等,引领基层多元主体展开联合共治。”^[30]一方面,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及时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三新”把握正确发展方向,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筑牢党在新兴领域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党组织围绕“三新”领域人员的核心需求(如政策咨询、业务发展、权益保障、技能培训、社会融入等)精准施策,打造“暖心驿站”“司机之家”等实体服务阵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有温度的服务赢得认同、激发活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再次,在技术维度上做到数字赋能,实现效能覆盖可持续。利用数字技术破解“三新”党建中的信息不对称、管理效率低、活动开展难等问题。一是建设智慧党建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动态更新的“三新”领域党员信息库,实现党员关系的线上转接、组织活动的线上开展、学习资源的线上推送,确保“流动党员不离线”。二是推行“线上+线下”双轨模式。通过开发小程序、APP等工具,方便党员随时随地参与组织生活、反映诉求;利用数据分析精准描绘党员画像,实现学习内容的个性化推荐、活动形式的定制化设计,提升吸引力和实效性。三是探索数字治理赋能,鼓励党员在参与基层治理、异常情况预警、社情民意传导等方面发挥“移动探头”作用,通过平台进行积分激励,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2. 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治理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31]。加强“三新”党的建设,核心在于确保其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治理架构,则是强化政治引领功能的根本性解决路径。

“双向进入”主要指党组织成员依法依规进入“三新”的经营管理层、理事会或重要决策机构,同时支持“三新”中的经营管理层、技术骨干和先进分子中的党员,依照党章规定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则是其具体实现形式,“是指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32]。这一体制实现了党组织从外部性存在向内部性治理的结构性嵌入。党组织通过其成员进入治理结构,深度介入重大决策的前端,从而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种制度性资源,直接注入组织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日常运营中,有效避免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的困境。具体而言,在新经济组织中,大力推行企业出资人、法定代表人、高管与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或由高管党员兼任党组织委员的模式,确保党组织在重大决策中有话语权、在经营管理中有影响力。如济南市“17家市属企业及其523家权属企业完成了‘党建入章’,所有市属企业均实现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33]。在社会组织,推动党组织书记进入理事会或担任监事,同时推荐理事会、监事会中的党员负责人进入党组织班子,确保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公益性方向不动摇,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对于新就业群体,探索在行业性党组织中实现功能性的“双向进入”。如在成立的快递行业党委或网约车行业党总支中,吸纳平台企业区域负责人、加盟商负责人、党员站长以及优秀骑手、司机党员代表共同组成班子,使党组织的决策既能上传下达,又能反映一线劳动者的真实诉求,实现政治引领与行业自律、权益保障的深度融合。

3. 提升队伍素质,健全“选育管用励”全链条的闭环体系

党务人才队伍作为党的肌体的“活性细

胞”与具体工作的“执行终端”,是提升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的核心能动要素。

其一,拓宽视野,创新选拔机制。坚持内育与外引相结合。内部注重从“三新”经营管理人员、业务骨干、优秀青年员工中发展党员,还可将部分党员培养为党务工作者。这类群体通常是技术研发、项目管理与业务运营的核心人员,他们深植于生产一线,熟悉行业规律,具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和影响力。可有意识地将他们纳入党建体系,使其成为组织建设的推动者、政策理论的传播者、职工群众的服务者,实现党建工作与创新发展同频共振。外部可探索专兼职结合模式,如从退出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优秀退休党务干部中选聘党建指导员,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借鉴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建立党务人才任职资格标准,实现精准选配。

其二,精准赋能,构建培育体系。培训内容上强化政治训练,大幅增加市场化、法治化、社会化能力的供给,如现代治理、风险化解、新媒体运用、群众工作等实用技能。培训方式上应打破传统课堂模式,更多采用案例教学、现场观摩、沙盘推演、线上课程等多元化手段,依托党校、干部学院、高校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三新”党建实训基地,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深度融合。

其三,强化激励,完善保障机制。畅通党务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探索建立专业职务序列和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与其薪酬待遇、职级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推动“三新”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用税前列支、党费全额返还等政策落实落地,为党务人才开展工作和享受待遇提供稳定经费保障。

其四,搭建平台,促进协同共享。借鉴“区域化党建”理念,在园区、楼宇、商圈等建立党建联盟或人才工作站,“充分发挥其地域网络

化、主体多元性、动态开放性等特点优势,打破传统‘单位党建’以及现行‘领域党建’‘行业党建’和‘社区党建’的封闭运行模式,通过整合区域党建资源来吸纳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34]。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为党务人才提供线上学习、交流、管理和服务的支撑,减轻事务性负担,提升工作效能。

4. 夯实制度根基,调整优化“双轨制”资源整合机制

在加强“三新”党建过程中,制度保障发挥着基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处理好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的关系。制度制定很重要,制度执行更重要。”^[35]要“推进基层党建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手段创新,在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上下功夫”^[36]。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领导协调机制,破解“条块分割”。通过制定清晰的“权责清单”,明确组织、宣传、统战、工信、市场监管、民政、工会、共青团等各“条条”部门在“三新”党建中的具体职责与协同义务,减少职责交叉,杜绝推诿扯皮。在园区、楼宇、商圈等“三新”聚集区,推动建立由属地党(工)委牵头,吸纳驻区单位、代表性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党建联盟”,此类联盟定期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并督办落实,“在推动资源优化整合、创设发展优势、凝聚治理和发展合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37]。在党建工作考核中,增设对相关部门协同效能、资源下沉效果的评价指标,引导“条条”部门从单纯向下布置任务,转变为主动为基层提供资源和支持,形成协同共治的激励机制。

二是推动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建设,消解“碎片化”治理弊端。探索在区、街道(乡镇)层面设立党建资源库或党建服务综合体,对场地、师资、课程、经费、项目等资源进行集中登记、统

一管理和按需配送。推行“菜单式”服务模式,让基层党组织“点单”,平台“派单”,实现资源的精准高效配置。在财政支持和党费使用上,尝试设立“三新”党建专项基金,以项目化方式支持基层创新实践。同时,鼓励通过党组织共建、企业赞助、社会捐助等多种方式拓宽资金来源,并建立规范透明的使用监管制度。大力推进区域性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将其打造成集教育、管理、服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向区域内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开放。

5. 深化协同治理,激活“党建+社会责任”的双轮驱动效应

“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要求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同,这些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38]“三新”党建的核心任务之一,应从“管理控制”转向“协同引领”,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激活各主体社会责任内驱力,形成政治引领与社会价值创造的良性互动。

一是明确功能定位,拓宽作用发挥渠道。党组织聚焦“政治引领”与“服务增效”双功能。政治引领体现为宣传党的政策、保证发展方向、凝聚职工群众,服务增效则体现为助力业务成长、解决实际困难、对接政策资源。例如,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技术攻关小组”等方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搭建劳资对话平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链接社会保障资源,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话语权。

二是创新价值整合,增强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本质是统一思想、争取人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党的旗帜下步调一致向前进。”^[39]针对价值多元化特点,党建工作须超越传统教化模式,以社会责任为纽带构建“意义共同体”。通过开展公益项目、可持续发展倡议、行业伦理建设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

文化和职业伦理中,引导从业人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三是强化实践创新,打造品牌项目。围绕科技创新、美丽乡村等国家战略,设计既体现党的宗旨又展现社会责任的项目载体。如组织党员技术骨干开展“技术扶贫”专项行动,建立“党员责任区+社会责任示范区”双标共建模式,开展“党建引领+创新实践”试点等。

四是完善政策支持,优化协同环境。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出台激励性政策,如将党建成效作为企业评优评先、政策扶持的参考依据;推动行业协会制定党建与社会责任融合的行业标准。同时,探索“党建+信用”评价机制,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给予正向认可,形成“党建引领—责任履行—社会认可”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加强“三新”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从政治之维看,是巩固执政根基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必然选择。“三新”领域既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各类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交汇点,若党的领导在此弱化甚至缺位,势必会形成执政体系的“空白地带”。加强“三新”党建,确保党的领导全面覆盖、全面落实,有效防范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这是党主动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强化政治整合、永葆生机活力的战略举措。从治理之维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三新”领域业态模式新、组织形态活、流动性强,给传统的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容易出现治理盲区。加强“三新”党建,将党的组织体系深度嵌入这些新兴治理单元,使其成为党联系社会、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引导“三新”

人员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承担社会责任,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将其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治理轨道,从而填补治理缝隙,提升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有效性。从发展之维看,这是引领和保障“三新”领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新”领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蓝海”,党建工作并非外在于业务发展的附加任务,而是为“三新”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精神动力和组织保障,确保其发展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从而不断巩固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根基,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发展的深度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8-199.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4] 陈亮.“三新”党建的网格化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J].探索,2024(6):77-89.
- [5] 刘振鑫,王金柱.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逻辑理路与优化路径[J].治理现代化,2025,41(3):33-42.
- [6] 陈宁静,夏琼.论“三新”党建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J].领导科学论坛,2025(1):62-65.
- [7] 王文成.推动“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2):91-98.
- [8] 申富强,张庆宇.新时代“三新”党建的价值及其面临困境的破除路径探析[J].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5(2):96-103.
- [9] 张勤,覃宇冰.党建引领与“三新”发展双向赋能:理论根基、现实需要与实践进路:基于“政党功能-社会治理”视阈[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4(12):5-12.
- [10] 陈波,高学勇.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逻辑理路[J].党史文苑,2024(10):137-139.
- [11] 金庭碧,李美玲.加强“三新”党建面临的问题及途径思考[J].理论视野,2025(4):86-91.
- [12] 刘正环.“三新”党建的新特点、难堵点及落脚点[J].大庆社会科学,2025(6):85-89.
- [13] 杨昕.“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变革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J].中国领导科学,2023(5):82-89.
- [14] 祝全永,刘彤.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7):11-21.
- [15] 刘银喜,龚慎思.将“三新”组织党建贯穿社会工作全过程的路径分析[J].中国社会工作,2024(12):16-18.
- [16] 臧秀玲.探索“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J].人民论坛,2025(4):78-81.
- [17]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8] 陈云.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81.
- [19] 郭群英.中国共产党党员主体地位及其实现途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
- [20] 邹英,向德平.风险理论视域下原子化社会的个体危机及其化解途径[J].新视野,2016(6):32-37.
- [21] 张俞杉,陈琤,李延伟.公共管理中的跨界行动者:理论脉络、研究框架和未来展望[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6):23-42,125.
- [22] 黄晨熹.“三新”组织和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图景[J].人民论坛,2025(10):15-21.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8.
- [24] 张紧跟.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建设刍议[J].国家治理,2023(8):56-60.
- [25] 廖小平,周泽宇.价值观的分化探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为背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0(5):15-21.

(下转第55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2] 钱学森等. 论系统工程[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0.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 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M]. 张廷国,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7.

[5]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N]. 人民日报,2025-02-28(6).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6.

[8]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5.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0.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1.

[责任编辑:王天笑]



引用格式:徐宁,李娜. 系统观统领下党纪教育的贯通协同策略[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5):48-55.

(上接第47页)

[26] 漆程成,邱琪昕. 以“条块结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困境:基于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的案例分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3):84-91.

[27] 中共中央组织部. 坚持改革创新 服务科学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组织工作的进步历程(2002—2012)[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0.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9.

[29] 汤彬,王浦劬. 属地化治理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5(6):128-147,207.

[30] 唐兴军. 耦合与超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J]. 南京社会科学,2024(7):27-37.

[3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81.

[32] 宋清华,郑琳琳,陈奕景. 党委领导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视角[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16(1):108-138.

[33] 房爱卿,陈进行,赵长茂,等. 党建引领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济南实践[J]. 人民论坛,2025

(1):88-91.

[34] 孙肖远. 区域化党建创新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12):18-25,129.

[35] 习近平.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旗帜,2019(11):5-8.

[36]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3.

[37] 吴新叶,吕培进. 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J]. 学术界,2021(7):83-94.

[38] 孟庆瑜. 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法规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68.

[39]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8.

[责任编辑:王天笑 聂海杰]



引用格式:吴根甫,胡宜霖. 新时代加强“三新”党建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5):38-47,55.